

·人·间·世·

·人·间·世·

·人·间·世·

# 文人的悲哀

周 天 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



• 人间世 •

# 文人的悲哀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周天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

《人间世》丛书  
**文人的悲哀**  
周 天

---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0.75印张 2插页 220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

ISBN7—80549—133—X/I·92

---

定价：4.20元

## 编 辑 说 明

《人间世》是一套综合性文化丛书。

《人间世》的主要议论对象是人。

人改造了自然，人创造了文化，人正在向广袤而神秘的外层空间进发。然而，对于万物之灵的人来说，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认识人类自己。

千姿百态的人组成了大千世界，纷繁的人类社会不断组合、分化、演进。此人与彼人、先人与后人、男人与女人、伟人与凡人、统治人与被 人 统治的人……彼此间应当如何相处，方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人的价值！这是一个亘古之谜，也是不少先哲孜孜以求的课题。在思想日益活跃起来的今天，让我们通过认真反思，去求索、去寻找、去破译。

《人间世》在选稿上不拘一格。凡是能够从最新角度提出问题，观点独到、思想锐敏、文笔犀利、形式活泼的著作，其作者不论名家或新秀，均可加入探索者的行列。

《人间世》欢迎广大读者及时提出宝贵批评，使这套书成为沟通人们心灵的桥梁，成为读者的良友。

## 序

一九八八年二月末，春节刚过，《文人的悲哀》一书初稿完成，于是写序。

这本书，是对西汉时期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解剖。

为什么解剖的是西汉时期，而不是其他时期？因为，西汉时期的知识分子状况，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有代表性的。解剖这个麻雀，可以连类、推理而及其他历史时期，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封建社会中许多有趣的、可悲的、而又是发人深思的现象。比如：知识分子在群雄割据、争斗的历史时期和在中央集权的历史时期，地位、处境上有什么差别？知识分子当中的思想家们，同掌握政治实权的政治家们，作为同一阶级在著作上和政治上的不同代表，他们之间何以时分时合，何以会发生时而配合行动、时而尖锐摩擦的复杂关系？知识分子当中的真正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在他们的思想、见解不能为当代政治家所理解时，他们能做些什么？而掌握政治实权的政治家，如果不善于吸收同时代的思想家的积极的思想成果时，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御用文人是怎样产生的？御用文人当中何以也能产生有历史地位的作家？诸如此类等等等等。也许，这些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带有某种普遍

性，也即是说，它们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封建社会，而且对于我们理解某些其他社会形态，亦有启迪。

西汉王朝，逐步地建立起了巩固的封建中央集权制，这使它和此前的朝代，产生了严格的区别。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在历史分期上，学者们还有所争论，但那是一个群雄割据、争霸而不是中央集权的时期，这一点任谁都不会有疑议；秦代虽然建立起了封建中央集权制，而成为汉代政治制度的楷模，人们也差不多一致承认，“汉承秦制”，但是它刚刚建立起中央集权后，就不幸短命死矣，以致，它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只有一种表面上的巩固的模样儿，纸扎的，雪堆的，碰一碰就垮了，所以从形式上看，制度上很有点样子，实质上却没有能提供深刻的历史经验，甚至它所提供的历史教训，也显得浮浅而不能具备足够的历史深度。比如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烧了一批书，杀了若干知识分子，据《史记》说是四百六十多人，也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暴政的典型，再往深里分析吧！也终究不过是中央集权下企图统一思想的一种幼稚阶段，就象幼儿园的教科书一样，看图识字，一望可知，而秦始皇死后秘不发丧，以致他的尸首放置过久发出臭味，不得不放些鲍鱼在旁边，以真乱假，加上秦二世被赵高的指鹿为马弄得心悸怔忡，神魂不安，最多也不过是预示了，在中央集权下，倘若权力过分集中于皇帝一个人身上，这个人会在怎样的条件下转化为名符其实的独夫，它的真正意义，由于现象的过于肤浅还无法彻底表达，还需要经过此后的更有深度的独夫的命运悲剧，才能逐步揭示和昭明。汉代的思想家比秦代高明得多，也深刻得多，其原因之一，也许就是，

汉代的独夫比秦代也有深度得多，他们给汉代思想家提供了可以进行深加工的历史素材。

说到底，西汉这个朝代，掌权的时间比较长，于是，封建中央集权制便经历了一个由不巩固到巩固、又由巩固而暴露出新的弱点的特定历程，因而，这个时期在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都提供了较为丰富和复杂的经验和教训，自然，文人命运方面，也同样有许多材料可供我们咀嚼了。

文人，也即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大致是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特定阶层。这个阶层，在总体上，毫无疑问，是制作思想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是一些统治阶级在著作上或者说是在意识形态上的代表人物。按说，文人的命运，应该和统治阶级同步，同作为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国家的兴旺发达与否同步，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历史状况倒常常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而制作思想的人们，就每一个单个的个人而言，他们往往并不一定因制作统治思想而从自己阶级得到什么特殊的好处，若再具体就西汉而言，得到好处的往往倒是庸人而并非货真价实的思想家，思想家的处境却并不怎么佳妙，而那些对阶级的统治作了杰出贡献的思想家的处境，更是尤其可悲，一些杰出人物的思想，有时确能导致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特别是当他们的思想为政治家所理解和采纳的时候，但这往往要发生在他们身后的许多年，作为生命有时而尽的个人，他们自己根本是看不到的。

不知是什么人说过，历史有时会导致悲观主义。也许，

西汉若干思想家的命运就是一种导致悲观主义的历史素材。他们的处境大致是可悲的。或者，思想家的这一特殊身份，本身就带有某种悲剧性的成分。思想家们因为熟悉历史经验教训和知识丰富而目光敏锐，同时他们由于某种在野地位，又较为了解实际状况和旁观者清，这样，他们的发现问题和提出疗救方案，有时确能比政治家们高出一头，或者预见得早一些；也许更令人心酸的事情是，若干思想家还由于深刻了解时弊、关心本阶级的前途、甚至是同情人民疾苦而自认为负有某种社会责任，他们往往为这种责任感所驱使，并为兜售自己的思想而朝着政治家喋喋不休，这是西汉思想家的先辈们，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墨、法等诸家，原是做出了榜样的。不过，西汉思想家所处的环境，同先辈们不大一样了，先辈们处身在群雄割据的政治局面之下，各国国君都要争取知识分子，所以兜售思想的最坏后果，也不过就是劳而无功，而各国国君对那些兜售思想的思想家及其门徒们，即便不取其思想，也还常会在经济上有所馈赠，甚至采取养起来、包下来的办法，象齐国临菑的稷下学者食大夫之禄那样，等而下之的还有战国四公子的食客三千。当然，上纲上线地说，也可以讲他们是靠政治家的残羹冷肴过日子，也不免有些可怜巴巴的，不过大家都是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些不同方面的代表人物，其实本来是一家子，所以这种上纲上线并无实际必要性。那个时期当然也有赔上脑袋的思想家，不过那是比较个别的情况，或者是已经兜售思想成功转化为政治家而在政治角逐中失败遇害，则又当别论。而处在封建中央集权制之下的文人们呢？兜售思想的进行，



已经远不如他们的先辈们那样自由和随意了，他们只能向一个唯一的皇帝去兜售，而不能象春秋战国时期的先辈们那样到处转悠，兜售时也得不到先辈们所享受的那种礼遇，那是更不必说了；而兜售思想失败的后果，却又比他们的先辈们凄楚和惨重得多。这样看来，当一个阶级的思想家，在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条件下，实在是选择了一种特别可悲的职业：察见渊鱼者不祥！而那些高出政治家一头的思想家们，便往往面临着令人伤心的抉择。我们在本书中，将能看到一些这类的例子。

这也许从根本上就不应该怪别人，而应该怪文人自己。因为，适应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经济需要，而将封建皇帝的地位和权力，夸张到无与伦比的高度的，不是别人，正是汉代的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不过，历史需要什么思想，这样的思想自会应运而生，如果说，经济需要比一百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技术前进的话，那么，经济和政治的共同需要，更是毫无疑问地召唤与此相适应的新思想的出现，这是历史规律，从来如此。而可悲的却是，在当时，强调皇帝的无与伦比的权威，恰恰是一种新思想，因为封建中央集权制对于历史而言，正好是一个新事物。有那么一批文人，为巩固这个新事物制作思想，本是应有的现象。但是，这一来，西汉的所有知识分子也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和他们的先辈们全然不同的历史环境，他们任怎么样跳跃和挣扎，也难越雷池一步，就象孙行者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至于我们后人呢？你怎么为他们的命运而感慨，而长叹，都无济于事，时钟可以倒拨，而历史却不会因为一千声、一万

声长吁短叹而倒转过来重走一次；后人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只是，从中找出对人们有益的历史教训来。

由皇帝一个人，掌握着天下生灵、包括文人的命运，这种制度的弊病，今天的小学生，也能说个大略。难道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是些白痴吗？不！事情是复杂的，不仅封建皇权是历史的必经阶段，而且，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文治武功上超过任何前朝的成就，也蒙蔽着人们的眼睛，当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陶醉于自己阶级的成就时，他们的目光就不大会去扫视弊端了。不过，更值得一说的则是，当时的杰出的文人对时弊的分析，以及他们提出的救助方案，也同样使我们后代人感叹不已。比如说，就在西汉的汉武帝年间，几乎在儒家们泡制“尊天子”的统治思想的同时，作为史家的司马迁，就深刻地看出了皇帝个人专权对封建政治的害处，从而在他的千古名著《史记》里，根据历史上的若干思想素材，提出了一整套制约皇帝权力使其不致过于膨胀的封建制约思想体系，这比法国启蒙学者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提出资产阶级制约思想体系的时间，要早将近两千年。司马迁提出的封建制约思想体系虽然未能影响汉代政治，但却能不绝如缕地影响了班固、范曄等后代史家，并在这些后代史家根据新的历史经验所作的不断加工之下，形态更趋完整，终于在七百年之后，为杰出的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所接受，从此使封建中央集权制因封建制约思想体系的补充而变得成熟和活跃起来，写下了历史的新篇章，并且形成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

地主阶级政权所走过的这一步路，大约此后任何掌握

政权的阶级，都必须重复走一次，任何掌权的阶级，都必须建立起自己阶级的制约思想体系来，这个阶级的政权才能是成熟的政权。也许，这就是西汉文人命运、特别是西汉思想家的命运，所能昭示给我们后代人的最宝贵的历史经验。地主阶级瞎打瞎撞地走了七百年，才走完了这一步路，后代人如能从它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那么，路会走得平坦些，路程也会缩短些吧！

思想家的高出于时代之上的思想，要能得到政治家的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法国的启蒙学者们固然提出过相当完备的资产阶级制约思想，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许多思想家照样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了血的代价，此后过去了很长时间，资产阶级政治家才学会保护自己阶级的思想家，哪怕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也不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归根结蒂，这样做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有利。无产阶级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制约思想体系，历史上一切有益的制约思想素材都对我们有用，讨论西汉文人命运，这方面也或能给我们一些意外的益处。

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想说的内容的一个大要。这样看来，这本书应该是大致属于历史著作的范围，而和我所一贯从事的文艺理论专业，相去颇远。所以我还得在这里交代一下，这一次何以会滑出本行，走岔了道儿。

其实一个人，生下来本是没有专业的，专业乃是学习所得。就我来说，原先当的是文艺记者，专业是新闻工作，业余学写点文艺理论文章，大概就是因了这点业余爱好吧！后来奉领导之命，转入出版社专搞文艺理论，于今三十年有零，于是，原来的业余爱好就上升为专业。最近几年，

鬼使神差，慢慢地和文艺理论又有些若即若离了。忽而业余上升为专业，忽而专业又似乎巩固不下来，都并非出于我的主动意愿，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冥冥中似有一支神秘的指挥棒。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命运，不过我懂得，偶然性在必然性的交叉点出现，人的生活常常不是两条线交叉为点，而是多条线在重叠交叉，所以那交叉点落在何方，确实也不那么容易预先算计得准确无误。

不过我们现在不去说客观原因，单讲主观条件，我这个入兴趣比较杂，确实也是常常不安分于自己专业的原因之一。前几年一时兴起，写了一本科普散文《蜜蜂王国见闻》，还为科教片《蜜蜂王国》执笔写了文学本，朋友们大见惊异，查询颇详，不甚其解释之苦。所以这一回要预作解释，好省却今后许多口舌。

为什么一些人的兴趣比较庞杂，另一些人的兴趣比较专一？这原本就是很难确切解释的事。或许是生性如此，不知道不同的神经类型，与此有无关系？或许是习惯使然，一个人接触范围比较杂，性格内部或也就传染上了庞杂的因素？或许兼而有之！就我来说，大致是编辑这个职业对我的渗透。因为当编辑就不免要审一些自己专业以外的稿件内容，所以读书就不能不杂。久而久之，职业习惯便渗透而成为性格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因素呢？也许那读杂书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我的家庭，从祖先而言，是所谓书香世家，也就是虽穷而又要摆知识分子架子的那种家庭，房子不算小，但穷得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唯有藏书，却是成房间的堆放着古书，包括科举时代考场作弊用的那种只有半个巴掌大小的四书五经，应有尽有，小时候读过

几年私塾，和祖父用戒方加糖果训导而得的古文基础，使我在阅读那些古书时，大致上没有文字障碍。而“五四”以后的各种洋书呢？又因为父亲是三十年代大学毕业的洋学生，也买过不少，我记得单是《小说月报》，就占有某一书橱的将近两格的地位。这些书籍，祖父和父亲对我们弟兄，采取的是绝对开放政策，包括那些甚至现在也并不公开发行的书籍，如《金瓶梅》、《野叟曝言》等等，也是听任我们翻阅而毫无禁忌。我们弟兄们，亦不如今天的一些青年那样易受传染，似乎那些诲淫诲盗的书籍也不能教坏我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只不过或者就此养成了爱看杂书的习惯。总之，杂的癖性之养成，其源非一，殊途同归，弄得自己这些年来，东一锄头西一棒，转悠多年而无所造诣，看看一些朋友，精通一经而成就非凡，虽然临渊羡鱼，不过退而依旧不改读杂书之癖，自己对自己也是无可奈何。

这就足以解释，多年来搞文艺理论专业，而这趟却又向历史伸一只手的原因。

不过，追究其所以伸手的原因，却还是因搞文学理论而引起的，理由充足，聊可自慰。自打前年初开始，我下定决心，目不邪视，想把多年来积愿要写的《中国古典小说性格描绘史》完成之。到去年年底前，终于完成了第一卷“先秦两汉卷”。谁知道，因为写这本书，认真读了一点先秦、两汉的史籍，却又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生了兴趣。有两句重新流行的旧歌怎么唱的？“酒不醉人人自醉，胡天胡地断送了青春。”读书也是如此，书不醉人人自醉，进去了就很难出来，一晃半年把就这样混过去了。起先我

关心的，只不过是《史记》、《汉书》的性格描绘，但不久就致力于探究，何以汉代正是把皇帝的权威强调到至高无上程度的时候，《史记》、《汉书》中所写的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却又能把他们写得如此生动、真实而复杂？除了刘邦的大度豁达和刘彻的雄才大略以外，刘邦的无赖气，刘邦对功臣们的辣手，刘邦在面临吕后权势日重而产生的内心悲哀，刘彻的迷妄鬼神，刘彻因为刚愎自用而造成的晚年悲剧，及其内心世界的痛苦不安和自谴自责，都是跃然纸上，如见其人。特别是《史记》，写于西汉的汉武帝同时，对开国皇帝刘邦和同时代皇帝刘彻，敢于那样不避忌讳地真实描写，更属令人吃惊！而那又是一个“能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使文人思想窒息、噤若寒蝉的时代，且儒家又正是把皇帝头上的光圈加亮加足到不能复加的程度！那么，在司马迁那里，皇帝们头上的光圈是怎么卸掉的？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对皇帝的看法，独异于众，这里有胆和识两个方面的问题，有识无胆固然不行，有胆无识同样不中！于是，我就很自然地生出细致地探究司马迁的世界观的想法，而为要细微地探究司马迁的世界观，我也就不得不进一步研究西汉的历史，西汉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状况，终于，写作“性格描绘史”的需要、兴趣、杂的癖好等多种因素，使我不知不觉地越来越游离文学理论，而靠近史学。

当然，所谓“靠近”，自是一个严格的、科学的定语。我只不过是靠近史学，并不可能真正钻进去。人家治史的学者，一生专攻某个朝代，皓首穷经，还要自谦地说什么刚刚入门之类的套话；我只不过是在旁边瞄一瞄，哪怕是“入门”二字，又哪里临得到我说。不务正业总是要

受惩罚的：正业丢了，旁门也不敢说进了。骡子跌斤斗，两头不着实。不怨天，不怨地，纯系自作自受，只不过是落得了若干兴之所至，无挂无碍地读书的快活日子，总算不吃亏。

于是，在读书的过程中，这就产生了若干想法。读杂书的人，脑子不大规范化，今天往这个方向想，明天又往那个方向想了。好象吉普车在没有路的荒原上乱蹦一样。一九六五年我随上海慰问团去新疆慰问上海知识青年，在去北疆奎屯的路途上，就尝过这种乱蹦的滋味，吉普车尽在大小石块上跳跃，五六个钟头蹦下来，骨头就象全散了架一样。那时候我就想过，鲁迅先生说，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为路。躺在沙发上读这句警句时，是舒舒服服地欣赏其中的警策之处的；真个自己在没有路的地方走一走，那滋味可不好受！幸好，还有辆汽车，不是走，还有识路的司机，并非在全然没有路的地方开路；这也就足够教训我体会鲁迅先生那句警句的份量了。如今我自己脑子里在乱蹦了，天晓得会蹦到哪里去！不过，世界上也真有无师自通的事情，后来，蹦着，蹦着，自己也就觉得渐渐有头绪了，怎么个蹦出头绪来的，自己也说不清楚。记得小时候读私塾的时候，背四书五经，先生全然不作讲解，只教识得，背得，滚瓜烂熟，先生说：“背熟了就会懂！”果然有道理。到后来，没有人讲解过的四书五经，真个就无师自通地看懂了。我因为读历史并无师承，理思绪全凭随感，所用的大致还是私塾老师教给我的一土二笨的办法，比起现在的什么论什么论的据说是极为科学的洋办法来，自然是瞠乎其后、望尘莫及的，实际上

大约还是有司机和吉普车在暗中帮忙，不过因为方法无科学可言，所以连自己也说不清楚就是了。总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自认为对西汉历史有一点自己的看法了。不过，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只用以作写“性格描绘史”之参考，并没有真的想在历史方面写点东西的打算。

不是我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最后造成我连这点自知之明都不管了，真个动笔写这本书的，却是邢良俊同志。去年夏天，良俊同志来上海，我们闲聊，那时我正是对西汉知识分子的思想窒息和司马迁的独异于众这一问题最感兴趣的时候，所以一聊就聊到这个题目上去了，良俊同志感兴趣的程度，比起我来，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竭力鼓动我把这个题目写出来，并且代表新成立的华岳文艺出版社，当场约稿。以我和华岳的关系，这一约稿几乎是无法拒绝的。华岳的前身是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部，华岳的总编王平凡兄是在我闭门读书、无意撰述时来我家看我，并且约定出版我的《〈长恨歌〉笺说稿》一书的同行，而良俊同志甚至在我父亲尚未改正的时候，就毅然出版了他的译著，这件事对老人心情上的支持，可想而知。如果说，平凡兄和我还是因为大家都是搞文艺理论的出版界同行，有些旧交的话，而良俊同志不管是和我父亲，或是和我，都是素不相识的。我想，她这样做，也不过是对一位遭受多年磨难和挫折的老人之仍能坚持译书，表示了一种心情上的支持。尤其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件事之间，并无联系，王、邢二位，自己起先也不知道，他们手上的这两位译者和作者，竟是父子二人。也许这种偶然的巧合，倒正是说明了那时的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部的一贯作风，司



空见惯寻常事，但是，作为当事人，作为人子，我却始终铭记在心里，不可磨灭。人和人之间，是需要一点心情上的支持的，我们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每当看到“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之时，常常会不自觉地感到一阵透骨的凉意，凉得汗毛都竖起来了，那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怎么会把在他领导下的人与人的关系，弄得如此冷酷而凉薄，一人倒霉，全社会鸦雀无声！这样看来，司马迁在《史记》里，所强调地描绘的古代知识分子和古代人们之间的守信义、重然诺、排难解纷、言信行果的社会气氛，岂不是对汉武帝的酷刑淫法所造成的凉薄的人际关系的有效纠正吗？如此说来，《史记》对培育后世人们的高尚情操所起的作用，真是不可低估。当今这个世界越来越趋于物质化，我却在这里讲什么心情上的支持，未免怀古复旧，不过，传统道德中的美好的东西，既然无法一笔勾销，它们便终于会不绝如缕地延续下去，《史记》的越过那许多速朽的王朝而傲然地留传于今日，便是一个证明。华岳社的这种传统作风，我在考古学上找到了根据，不知平凡与良俊二位，以为如何？

说这点我和华岳之间的关系历史，只不过是说明，我乐于不自量力地接受这一约稿时的心情。人总是会有升沉浮落的，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缓急，人之所常有也。”所以，在这个物质世界上，受一点白眼，领略一点世态炎凉的滋味，几乎是每个人对这个物质世界所必尽的义务，也许我多少经历过一些人世间的升沉浮落，所以对这种人和人的在心情上的支持，就愈感宝贵。有一天如果